

第五章 三國綜合比較與結論

本章主要根據前三章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第一節比較國際政經因素。第二節比較制度基礎的異同。第三節分析三國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與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兩項因素，對短期金改類型和長期金改路徑的影響。最後，第四節針對全文主要論點與未來研究方向作結論。

第一節 影響三國金融-政治發展歷程的國際政經因素

國際強權政經勢力均曾對三國金融-政治發展帶來深遠影響。這些影響主要包括以下三項：

第一，殖民統治經驗的影響。智、韓、巴三國由於分別經歷西班牙、日本與葡萄牙的殖民統治，其國內經濟結構在獨立初期仍延續殖民母國設下的發展路徑。國內金融活動與各項經濟制度最初只為配合舊殖民經濟體系而運作。在智利，西班牙的殖民統治建立了依賴經濟結構，金融體系只為服務國內農產品、礦產與初級產品出口的商業貿易活動。

在南韓，逾 30 年的日本殖民統治，雖使李朝時期的傳統農業經濟開始工業化，但朝鮮半島的經濟卻需配合日本的戰時經濟體制。金融體系的建立也以日本對海外資源的動員與日本國內企業的需要為依歸。在巴西，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使巴西出現依賴經濟結構，農產品與原物料出口成為經濟主軸。葡萄牙人雖將銀行制度引進巴西，但英國商人才是巴西獨立後現代金融體系的主要奠基者。

第二，國際強權的影響。1930 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之前，英國商人大致主導智利與巴西獨立後的出口貿易和國內金融市場。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政經殖民，則要等到二次大戰結束後才告終止。20 世紀初，隨著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新霸權，美國透過智利和巴西對美出口與資本輸入的依賴，開始展開對兩國的政經經略。在智利，1920 年代中期由於美式金融制度的移植，直接強化美國對智利的政經影響。二次大戰期間美巴兩國的軍事同盟關係，更開啓美國經援巴西的序幕。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軍軍事佔領南韓。韓戰結束後，美國又對南韓投入大量軍經援助，使南韓的政府體制、金融制度與經濟政策，均受美國極大的影響。同時期，美國政府為貫徹圍堵政策，也開始加強對巴西與智利的軍經援助。1950 年

代中期以後，隨著南韓與巴西反共態勢趨穩，美國開始逐漸減少援助，導致韓、巴兩國政府無法借重美援推動工業化，因而與美國漸生嫌隙。

1950年代末，古巴共產革命成功，促使美國重新加強對智、韓、巴三國的援助。在智利，美國政府支持Jorge Alessandri右派政府，希望壓制左派勢力。但在南韓，美國政府的強力道德與經濟支持，依舊未能挺助張勉內閣。1961年，朴正熙發動「516軍事政變」結束第二共和。至於美巴關係，在強調發展主義與民族主義的Kubitschek政府執政後，由於美國經援始終無法符合巴西的期待，導致雙邊關係開始從友好走向疏離。

1961-1964年，美巴對立升高，美國政府一方面大幅刪減對巴西的外援，另一方面積極資助巴西的反政府勢力，期望避免Goulart左派政府繼續執政。1964年，在美國的支持下巴西軍方成功發動政變，建立親美軍事政府。同時期，美國政府也積極援助智利國內的反左派政黨勢力，防止智利左傾勢力蔓延。1970-1973年，美國政府持續對智利左派政府施壓，並資助智利軍方與反左派政府勢力，但均未能根除Allende左派政府。1973年，繼韓、巴兩國之後，智利爆發軍事政變，建立親美軍事政府。

第三、國際組織的影響。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組織如聯合國、IMF、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等機構成爲英、美等國際強權外，對智、韓、巴三國金融-政治發展影響最鉅的國際勢力。由於這些國際組織由美國主導，國際機構對智、韓、巴三國的援助或貸款計畫，多半與美國的政策一致。1948年，智利成爲第一個接受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貸款的拉美國家。至1974年軍事執政團政府上台前，IMF與世界銀行的條件貸款是智利經濟政策的主要外援。

1953-1961年，美國與聯合國龐大的對韓援助計畫，不但左右南韓經濟重建，美國政府還運用李承晚政府想要加入IMF與IBRD爲談判籌碼，迫使南韓推動經濟穩定。1954年，美國與IMF雖然成功資助巴西Café Filho政府推動經濟穩定措施，但Kubitschek政府任內，卻因IMF與IBRD貸款條件太嚴苛，導致雙方關係破裂。惟1961年，Quadros政府執政初期，巴西政府爲取得IMF與歐洲銀行團國際信貸機構的支持，很快又開始執行IMF標準的經濟穩定措施。以上事例皆顯示國際組織與國際金融機構會直接影響智、韓、巴三國經濟與金融政策的走向。

第二節 三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制度基礎

國家行政權力的集中程度、推動經濟發展的角色與金融壓抑。比較三國工業化歷程，本文發現為使總統能夠推動工業化目標，就必須強化總統主導經濟與金融政策的政治地位。在智利，1925年憲法使政治核心由過去「議會共和時期」的國會，重回行政部門。在南韓，第一共和時期，憲政權力重心也由於李承晚不斷擴權，而向總統職位傾斜。在巴西「新國家」時期，Vargas總統第一次執政的威權統治，終結1891年第一共和憲法的「州長政治」時代，樹立了總統行政集權的地位，而1946年憲法則令巴西重回總統制民主。

有集中的行政權為後盾，智、巴、韓三國相繼採取國家干預規劃與執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政策（分別在1927-1931年，第一次Ibáñez政府時期、1937-1945年，第一次Vargas政府的「新國家」時期與1948-1960年，李承晚政府時期）。但推動工業化初期，三國均面臨國內資本不足的難題。為籌措工業化資本，國家同時介入金融體系的管理，並向海外借貸或引入國外資本，彌補發展經濟的資金缺口。三國都實施金融壓抑措施以資助國內工業發展。

憲政制度、多黨制與政治秩序。此外，三國在進入軍事政體前，均因原有憲政制度無法解決國內政治衝突與國家經濟困境，而以軍事政變收場。智利的1925年憲法與巴西的1946年憲法都強化了總統代表的行政權和憲政地位。但國會選舉多採取「開放名單比例代表制」，而使多黨制成為國會常態。這使得總統很難建立國會多數聯盟，也使總統與國會間的政治僵局很難解決。南韓第二共和時期，係採內閣制。這雖避免了類似情況，但由於張勉內閣的民主黨政府僅是反李承晚總統勢力組成的鬆散聯盟，黨內派系傾軋與內閣政治基礎薄弱。南韓因此與智利、巴西相同，均無法透過正式制度折衝政治僵局，或解決國家經濟困境，因而埋下軍事政變的種子。

民主和軍事威權的交替與金融自由化改革。1961年、1964年與1973年，韓、巴、智三國先後爆發軍事政變，徹底改變過去政治制度下，金融政治的制度架構。在南韓第三至第五共和時期，以軍事總統為核心的政治運作，使國會喪失實質的政策否決力，反對黨與社經勢力也失去參與政策制定的正式管道。巴西也出現類似情況。軍方頒布《制度法》將大權集於軍事總統一身，國會與各州喪失

了政策否決力量。政黨體系更因軍人專權，由多黨制轉為受到操控的兩黨制，社經勢力亦被排除在政策制定過程之外。

在智利，軍事執政團不僅解散國會，也鎮壓左派政黨和政治團體，使政治權力集中。1973年9月至1974年5月，智利的軍事執政團決策採陸、海、空與國家警察四位首長一致決原則，因而無法完全主導政策的制定與執行。1974年6月，Pinochet總統取得完整行政權，但軍事執政團內的其他三位軍警首長仍可透過「立法委員會」影響軍政府的立法過程。1980-1989年，軍事執政團在1980年憲法中加入保障威權政治勢力的制度設計，以限制日後政府大幅更動軍政府政策的可能性。

三國均朝軍事總統集權的方向發展，因此也都提高了改革金融壓抑的可能性，但最後三國金改卻大不相同。智利在1975年4月後，開啓「震盪-全面型」的金改。巴西在1964-1967年雖也成功推動部份改革，不過1967-1973年卻又重回國家干預與金融壓抑的老路線。1974-1985年，軍事統治結束前，巴西的金改是「延緩-有限型」。至於南韓，1961-1979年屬高度金融壓抑時期，直至1980年後才開始「漸近-部分」的自由化進程。

1985年、1987年與1990年，巴、韓、智三國先後轉為民主體制，政策否決點與否決者增加了，因此也提高改革的難度。相對於韓、智兩單一國制度，巴西的聯邦制不但提升了國會否決力量，也使總統很難建立國會多黨聯盟，同時各州的政治聯盟也成為新的否決點。反觀南韓，民主制度恢復後，總統仍享有優勢權力，也因而增加了改革的可能性。至於智利，1980年憲法大幅保障右派軍方的政策，否決點與否決者因而提高，現狀因而難以改變。

三國在進入民主時期後，金改路徑仍明顯分歧。智利在1990-2000年，依舊延續軍事體制時期的「務實新自由主義」路線。南韓在1993年後才進入金融自由化的加速改革期，至於真正的「結構改革」則要等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才展開。巴西在1990-1992年經歷第一次新自由改革的失敗，至1993-2002年的第二次新自由主義改革，才使金融改革竟其功。上述案例顯示，制度架構中的否決點或否決者的增減，會影響實際政策走向與改革結果。

第三節 政策取向、政策關鍵行動者與三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分歧

智、韓、巴三國有許多相似點。這些相似點包括：殖民統治、國際強權與國際組織的影響、金融改革期間均曾經歷民主與軍事體制、三國均具有總統制、多黨制、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發展等傳統，與改革前均為金融壓抑體系（如表 5-1）。但三國金改歷程，卻呈現短期金改類型與長期金改路徑的分歧。

表 5-1、智、韓、巴三國案例的相似點

國家	國際因素			國內因素				
	殖民統治經驗	先後影響國內金融-政治發展的主要國際強權	國際組織的影響	改革期間是否出現民主體制與軍事體制的交替	具有總統制傳統	具有多黨制傳統	具有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發展傳統	改革前曾出現金融壓抑體系
智利	西班牙殖民統治	1.英國 2.美國	IMF 世界銀行 IDB	是	是	是	是	是
南韓	日本殖民統治	1.日本 2.美國	聯合國 IMF 世界銀行	是	是	是	是	是
巴西	葡萄牙殖民統治	1.英國 2.美國	IMF 世界銀行 IDB	是	是	是	是	是

資料來源：整理自作者。

本文發現造成三國短期金改類型變動與長期金改路徑分歧的原因，主要係由下列兩項因素促成：第一，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係屬市場導向亦或國家干預，以及第二，政策關鍵行動者中，反對勢力否決力量的強弱。

運用這兩項因素的組合，本文可以清楚解釋 1961-2002 年三國短期金改類型的變化（大幅改革、緩慢改革、無改革或改革倒退）（如表 5-2）。然後，更藉由觀察三國短期金改類型的連續變化，呈現出三國長期金改路徑的分歧演變。

表 5-2、政策取向、反對勢力的否決力量與智、韓、巴三國金融自由化改革結果的分歧

		政策關鍵行動者裡反對勢力的否決力量	
		強	弱
執政聯盟內主導勢力的政策取向	市場導向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緩慢改革</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智利軍事執政團政府(1973-1975 年) 2. 巴西 Sarney 民主政府(1985-1990 年) 3. 巴西 Collor 民主政府(1990-1992 年) 4. 巴西 Franco 民主政府(1992-1994 年)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大幅改革</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智利 Pinochet 軍政府 (1975-1989 年) 2. 巴西 Castelo Branco 軍政府 (1964-1967 年) 3. 巴西 Cardoso 民主政府 (1995-2002 年) 4. 南韓全斗煥軍政府 (1980-1983 年) 5. 南韓盧泰愚民主政府 (1988-1989 年) 6. 南韓金泳三民主政府(1993 年) 7. 南韓金大中民主政府 (1998-2000 年)
	國家干預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無改革</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智利 Allende 民主政府 (1970-1973 年) 2. 巴西 Goulart 民主政府 (1961-1964 年) 3. 巴西 Figueiredo 軍政府 (1979-1985 年) 4. 智利民主協定政府 (1990-2000 年)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改革倒退</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巴西 Costa e Silva 軍政府 (1967-1969 年) 2. 巴西 Médici 軍政府(1969-1974 年) 3. 巴西 Geisel 軍政府 (1974-1979 年) 4. 南韓朴正熙軍政府 (1961-1979 年) 5. 南韓全斗煥軍政府 (1984-1987 年) 6. 南韓盧泰愚民主政府 (1990-1992 年) 7. 南韓金泳三民主政府 (1994-1997 年)

資料來源：整理自作者。

智利的「震盪-全面型」金融自由化改革。表 5-3 顯示，智利從 1970-2000 年間出現的短期金改類型依序為：1.無改革（Allende 民主政府時期）、2.緩慢改革（軍事執政團政府時期）、3.大幅改革（Pinochet 軍政府時期）與 4.無改革（民主協定政府時期）。Allende 民主政府時期與民主協定政府時期，雖然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均為國家干預，但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強大，使智利在這兩個時期均呈現無改革的狀態。

表 5-3、1970-2000 年，智利歷任政府推動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結果

執政政府	執政聯盟 內主導勢 力的政策 取向	國際的政策關鍵 行動者	國內的政策關鍵行動 者	反對 勢力的否 決力 量	政策結果
1.Allende民 主政府 (1970-1973 年)	激進派的 國家干預	美國政府 (-) IMF (-) 世界銀行 (-) IDB (-)	IVPs : 總統 (+) 國會 (-) PVPs : 人民團結陣線* (+) 基督教民主黨 (-) 右派保守政黨 (-) PAs : 全國農業協會 (-) 智利工業聯盟 (-) 生產與商業聯盟 (-) 軍方 (-)	強	無改革
2.軍事執政 團政府 (1973-1975 年)	漸進派的 市場導向	美國政府 (+) 國際金融機構 (+)	IVPs : 陸軍 (-) 海軍 (+) 空軍 (+) 警察部門 (+) PVPs : 基督教民主黨 (+) PAs : 生產與商業聯盟及其 成員 (+)	強	緩慢改革
3.Pinochet軍 政府 (1975-1989 年)	激進派的 市場導向	美國政府 (-) IMF (-) 世界銀行 (-) IDB (-) 國際私人金融機	IVPs : 總統 (+) 陸軍 (+) 海軍 (-) 空軍 (-)	弱	大幅改革

		構 (+)	警察部門 (-)		
			PVPs & PAs :		
			基督教民主黨 (-)		
			激進國際派聯盟 (+)		
			IVPs :		
			總統 (+)		
			國會 (-)		
			中央銀行 (-)		
		美國政府 (+)	國家安全會議 (-)		
4.民主協定		IMF (+)	憲法法庭 (-)		
政府	溫和派的	世界銀行 (+)	PVPs :		
(1990-2000	國家干預	IDB (+)	中間偏左民主協定*	強	無改革
年)		國際金融機構	(+)		
		(+)	右派政黨聯盟 (-)		
			PAs :		
			生產商業聯盟 (-)		
			地主精英階級 (-)		
			軍方 (-)		

備註：* 表示該政黨為執政黨。

(+) 表示政策關鍵行動者對政府政策有正面的影響力，或與政府關係為正向發展；

(-) 表示政策關鍵行動者對政府政策有負面的影響力，或與政府關係為負向發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第二章第三節。

Allende民主政府的政策取向雖為國有化的激進國家干預。但國會、基督教民主黨、右派保守政黨、全國農業協會、智利工業聯盟、生產與商業聯盟和軍方等，國內政策關鍵行動者構成的強大否決力量。再加上美國政府、IMF、世界銀行與IDB等，國際政策關鍵行動者對智利國內反對力量的強化，和對Allende政府直接施壓，均阻礙了Allende政府順利貫徹國有化政策，並導致最後以遭政變推翻收場。

民主協定政府時期，執政黨基督教民主黨雖屬意以溫和的國家干預，要求強調社會公平的改革。但國會、中央銀行、國家安全會議、憲法法庭、右派政黨聯盟、生產與商業聯盟、地主精英階級與軍方保守勢力等，形成的強大否決力量。美國政府、IMF、世界銀行、IDB與國際金融機構對過去Pinochet軍政府改革路線的支持，同樣使民主協定政府難以大幅更動既有的改革路線。

軍事執政團時期，海空軍、警察部門首長與漸進改革派組成的執政聯盟屬意漸進的市場導向政策，加上美國政府與國際金融機構對軍事執政團的支持，使陸軍與激進國際派，因無法完全阻止漸進改革派的改革，而使當時智利的短期金改類型呈現緩慢改革的結果。

惟Pinochet軍政府完全主導行政權後，以Pinochet總統為首的陸軍與激進國際派得以掌控全局。海空軍、警察部門首長與漸進改革派的否決力量轉弱。此時期，Pinochet軍政府雖因國內人權問題與美國政府、IMF、世界銀行及IDB的關係不佳，但其市場導向的經改，使得Pinochet軍政府依舊獲得國際私人金融機構的支持，順利推動大幅改革。圖 5-1 呈現智利從 1970-2000 年的長期金改路徑。由這段期間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與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兩因素相對位置的變化，可清楚觀察出智利「震盪-全面型」金改路徑的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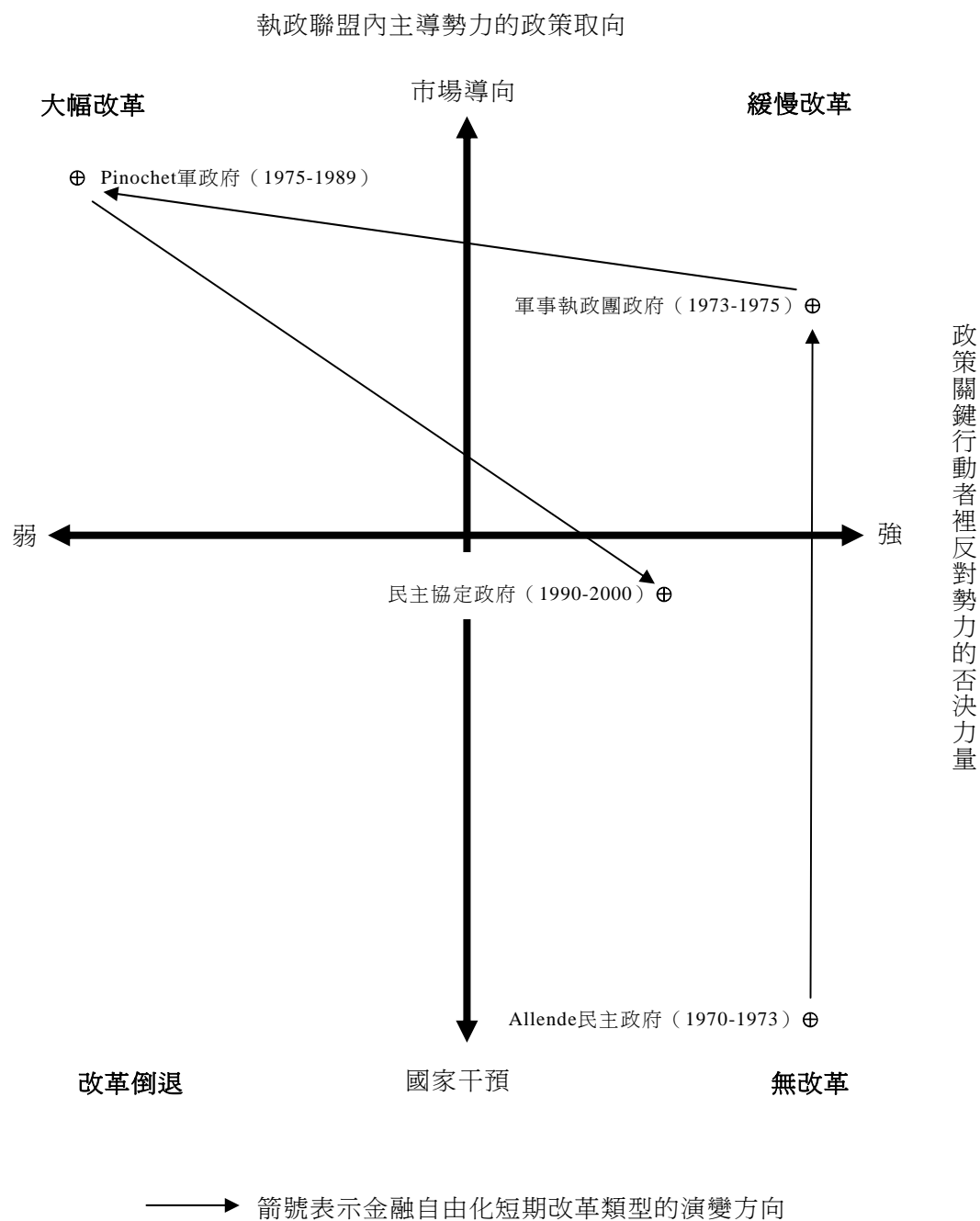


圖 5-1、1970-2000 年，智利「震盪-全面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演變路徑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表 5-3 繪製。

南韓的「漸進-部份型」金融自由化改革。表 5-4 顯示，南韓在 1961-2000 年出現的短期金改類型，只有大幅改革與改革倒退兩類。在此期間，反對勢力的否決力量均處相對弱勢的狀態，因此短期金改類型的變動，主要取決於執政聯盟內究竟是國家干預派或市場導向派，能克服聯盟內的反對，取得主導地位。當執政聯盟內主導勢力的政策取向為市場導向時，執政聯盟即會因反對勢力薄弱，而能貫徹改革，促成大幅金改。但若國家干預的政策取向在執政聯盟內取得主導地位時，金改便會由於缺乏反對勢力阻撓國家干預政策的推行而陷入倒退。

表 5-4、1961-2000 年，南韓歷任政府推動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結果

執政政府	執政聯盟 內主導勢力的政策取向	國際政策關鍵行動者	國內政策關鍵行動者	反對勢力的否決力量	政策結果
1. 朴正熙軍政府 (1961-1979 年)	國家干預	美國政府 (-) IMF (-) 世界銀行 (-)	IVPs : 軍事總統 (+) 國會 (+) PVPs : 民主共和黨* (+) 民主政治黨 (1963-1967 年) (-) 國民民主黨 (1967-1980 年) (-) 民主黨 自由民主黨 統一黨 PAs : 韓國工業聯盟 (+) 軍方 (+)	弱	改革倒退
2. 全斗煥軍政府 (1980-1983 年)	市場導向	美國政府 (+) IMF (+) 世界銀行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IVPs : 軍事總統 (+) 國會 (+) PVPs : 民主正義黨* (+) 民主韓國黨 (-) 韓國國家黨 PAs : 韓國工業聯盟 (-) 軍方 (+)	弱	大幅改革
3. 全斗煥軍政府 (1984-1987 年)	國家干預	美國政府 (-) IMF (-)	IVPs : 軍事總統 (+)	弱	改革倒退

年)		世界銀行 (-)	國會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PVPs :		
			民主正義黨* (+)		
			新韓民主黨 (1985-1988年) (-)		
			民主韓國黨 (-)		
			韓國國家黨		
			PAs :		
			韓國工業聯盟 (+)		
			軍方 (+)		
			IVPs :		
			總統 (+)		
			國會 (-)		
			PVPs :		
4.盧泰愚民主政府 (1988-1989年)	市場導向	美國政府 (+)	民主正義黨* (+)	弱	大幅改革
		IMF (+)	統一民主黨 (-)		
		世界銀行 (+)	和平民主黨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新共和民主黨		
			PAs :		
			韓國工業聯盟 (-)		
			韓國勞工聯盟 (-)		
			軍方 (+)		
			IVPs :		
			總統 (+)		
			國會 (+)		
			PVPs :		
5.盧泰愚民主政府 (1990-1992年)	國家干預	美國政府 (-)	民主自由黨* (+)	弱	改革倒退
		IMF (-)	和平民主黨 (1990-1991年) (-)		
		世界銀行 (-)	民主黨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PAs :		
			韓國工業聯盟 (+)		
			韓國勞工聯盟 (+)		
			全國勞工會議 (+)		

		軍方 (+)	
6.金泳三民主 政府(1993年)	市場導向	美國政府 (+)	IVPs :
		IMF (+)	總統 (+)
		世界銀行 (+)	國會 (+)
		OECD (+)	PVPs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民主自由黨* (+)
			民主黨 (-)
			統一國民黨 (-)
			PAs :
			韓國工業聯盟 (-)
			韓國勞工聯盟 (-)
			全國勞工會議 (-)
7.金泳三民主 政府 (1994-1997 年)	國家干預	美國政府 (-)	IVPs :
		IMF (-)	總統 (+)
		世界銀行 (-)	國會 (+)
		OECD (-)	PVPs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民主自由黨 (新韓國黨) * (+)
			新政治國民會議 (1996-2000年) (-)
			自由民主聯合 (1996-2000年) (-)
			PAs :
			韓國工業聯盟 (+)
			韓國勞工聯盟 (+)
			全國勞工會議 (+)
8.金大中民主 政府 (1998-2000 年)	市場導向	美國政府 (+)	IVPs :
		IMF (+)	總統 (+)
		世界銀行 (+)	國會 (+)
		OECD (+)	PVPs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新政治國民會議 (新千年 民主黨) * (+)
			自由民主聯合 * (+)
			新韓國黨 (大國黨) (+)

弱 大幅改革

弱 改革倒退

弱 大幅改革

PAAs :

韓國工業聯盟 (+)

韓國雇主聯盟 (+)

韓國勞工聯盟 (+)

全國勞工會議 (+)

備註：* 表示該政黨為執政黨。

(+) 表示政策關鍵行動者對政府政策有正面的影響力，或與政府關係為正向發展；

(-) 表示政策關鍵行動者對政府政策有負面的影響力，或與政府關係為負向發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第三章第三節。

朴正熙軍政府時期（1961-1979 年），以軍人總統為核心，國會、民主共和黨、韓國工業聯盟（代表大財閥勢力）與軍方均支持國家干預政策，其時反對勢力也非常薄弱。雖然美國政府、IMF與世界銀行長期施壓，要求朴正熙軍政府進行經濟與金融改革，南韓依然為高度金融壓抑的改革倒退期。

全斗煥軍政府執政前期（1980-1983 年）、盧泰愚民主政府執政初期（1988-1989 年）與金泳三民主政府執政初期（1993 年），因為總統支持自由主義派的經濟官員，來推動經濟與金融改革，而三度進入金改的大幅改革期。

但全斗煥軍政府執政後期（1984-1987 年）、盧泰愚民主政府執政後期（1990-1992 年）與金泳三民主政府執政後期（1994-1997 年），都因執政聯盟內韓國工業聯盟對全面金融自由化的反對，而必須改變市場導向的政策，重新採行國家干預政策。這導致南韓的短期金改類型三次由大幅改革反轉為改革倒退。此時，美國政府、IMF、世界銀行、OECD與國際私人金融機構等國際勢力，要求南韓推動金改的壓力，仍日益升高。由此可知，從 1961-1997 年，國際政策關鍵行動者對南韓施壓，雖有助南韓金改朝大幅改革方向發展，但國內執政聯盟的政策立場，才是決定這段期間短期金改類型的關鍵。

1998-2000 年，金大中民主政府時期，南韓的短期金改類型再度進入大幅改革期。此一時期，南韓的執政聯盟由長期從事反對運動的金大中總統、新政治國民會議、自由民主聯合與兩金政治聯盟主導的國會組成。金大中執政聯盟的政策明顯為市場導向，當時由於國家遭逢嚴重金融危機的衝擊，必須接受IMF嚴格條件貸款的規範。美國政府和國際私人金融機構也有大幅改革的要求。同時，反對黨新韓國黨，因重大經濟危機而被削弱，大財閥則有財務危機，這些條件使反對勢力無法否決金大中政府的結構改革計畫。

此外，金大中執政聯盟又設立了三邊委員會，化解來自韓國勞工聯盟與全國勞工會議等勞運團體的反改革力量。最後，由於金大中執政聯盟決心推動結構改革，而反對勢力當時也無力否決，再加上國際對金大中執政聯盟進行結構改革的支持。南韓因而能在金大中總統任內成功推動大幅改革，正式擺脫 1980-1997 年「拉鋸式」的「漸進-部份型」金改路徑（如圖 5-2 所示），達成南韓建立自由金融

體系的改革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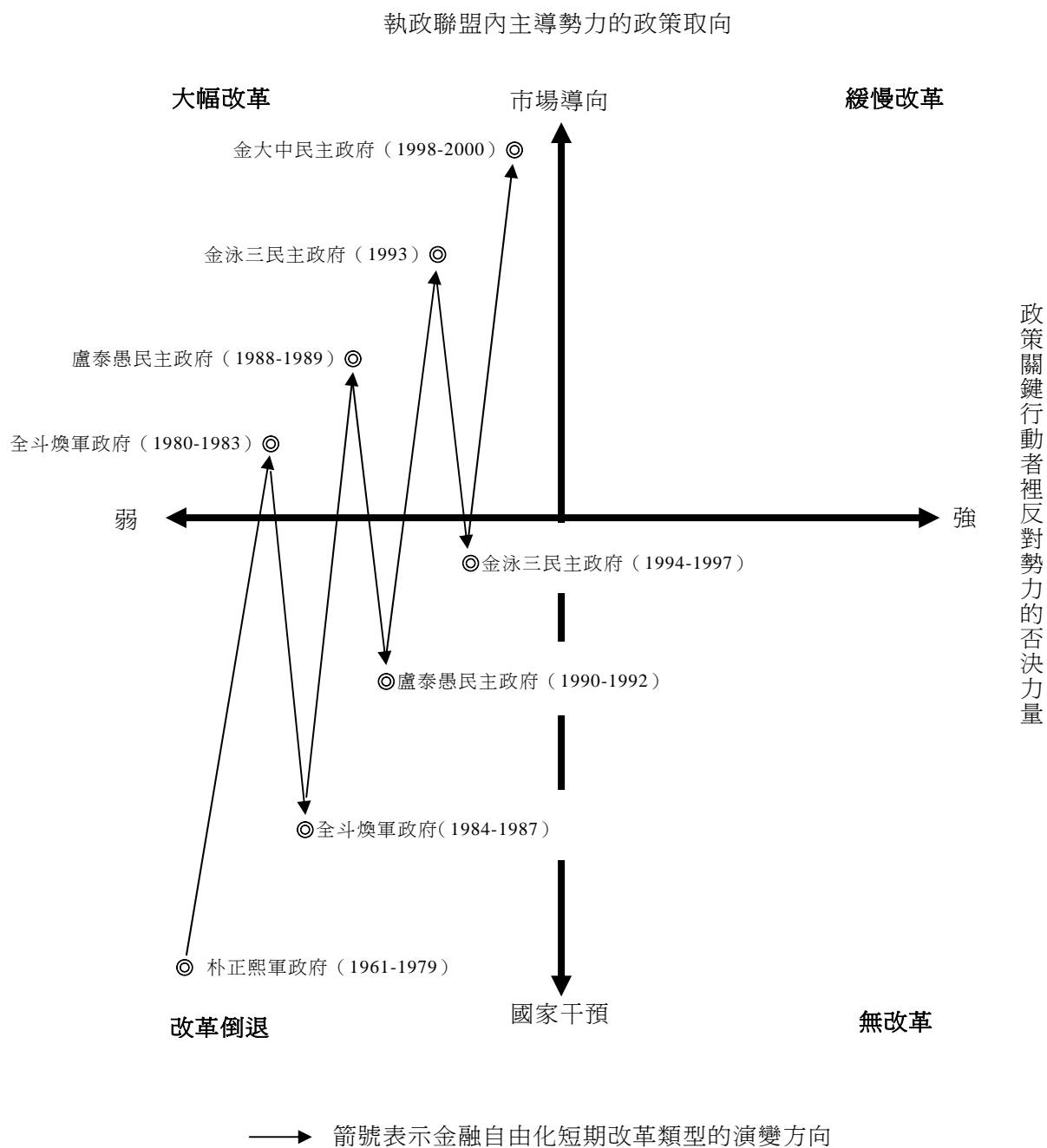


圖 5-2、1961-2000 年，南韓「漸進-部份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演變路徑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表 5-4 繪製。

巴西的「延緩-有限型」金融自由化改革。表 5-5 顯示，巴西從 1961-2002 年出現的短期金改類型依序為：1.無改革（Goulart民主政府）、2.大幅改革（Castelo Branco軍政府）、3.改革倒退（Costa e Silva軍政府）、4.改革倒退（Médici軍政府）、5.改革倒退（Geisel軍政府）、6.無改革（Figueiredo軍政府）、7.緩慢改革（Sarney民主政府）、8.緩慢改革（Collor民主政府）、9.緩慢改革（Franco民主政府）與 10.大幅改革（Cardoso民主政府）等，共經歷 10 個時期與 4 種類型變動。圖 5-3 顯示巴西在 40 年間長期金改路徑的演變。

表 5-5、1961-2002 年，巴西歷任政府推動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結果

執政政府	執政聯盟 內主導勢 力的政策 取向	國際政策關鍵行動者	國內政策關鍵行動者	反對 勢力的否 決力量	政策 結果
1. Goulart 民主政府 (1961-1964 年)	國家干預	美國政府 (-) IMF (-) 世界銀行 (-) IDB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IVPs : 總統 (+) 國會 (-) 各州州長 (-) PVPs : 巴西勞工黨* (+) 社會民主黨 (-) 全國民眾聯盟 (-) PAs : 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 (-) 巴西民主行動協會 (-) 軍方 (-)	強	無改革
2. Castelo Branco 軍政府 (1964-1967 年)	市場導向	美國政府 (+) IMF (+) 世界銀行 (+) IDB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IVPs : 軍事總統 (+) PVPs : 全國革新聯盟* (+) 巴西民主運動 (-) PAs : 軍方溫和派 (+) 軍方強硬派 (-)	弱	大幅改革
3. Costa e Silva 軍政府 (1967-1969 年)	國家干預	美國政府 (+) 聯合國 (+) IMF (+) 世界銀行 (+) IDB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IVPs : 軍事總統 (+) PVPs : 全國革新聯盟* (+) 巴西民主運動 (-) PAs : 軍方溫和派 (-)	弱	改革 倒退

		軍方強硬派 (+)			
4. Médici 軍政府 (1969-1974 年)	國家干預	美國政府 (+)	IVPs : 軍事總統 (+) PVPs : 全國革新聯盟* (+) 巴西民主運動 (-) PAs : 軍方溫和派 (-) 軍方強硬派 (+)	弱	改革 倒退
		聯合國 (+) IMF (+) 世界銀行 (+) IDB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5. Geisel 軍政府 (1974-1979 年)	國家干預	美國政府 (-)	IVPs : 軍事總統 (+) 國會 (+) 各州州長 (+) PVPs : 全國革新聯盟* (+) 巴西民主運動 (-) PAs : 大型工商業團體與大型私人銀行 (-) 軍方溫和派 (+) 軍方強硬派 (-)	弱	改革 倒退
		IMF (-) 世界銀行 (-) IDB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6. Figueiredo 軍政府 (1979-1985 年)	國家干預	美國政府 (+)	IVPs : 軍事總統 (+) 國會 (-) 各州州長 (-) PVPs : 社會民主黨* (+) 巴西民主運動 (-) 民主工黨 (-) 巴西工黨 (-) 勞工黨 (-) PAs : 大型工商業團體與大型私人銀行 (-)	強	無改 革
		IMF (+) 世界銀行 (+) IDB (+)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軍方溫和派 (+)		
			軍方強硬派 (-)		
			IVPs :		
			總統 (+)		
			國會 (-)		
		美國政府 (-)	各州州長 (-)		
7.Sarney民		IMF (-)	PVPs :		
主政府	市場導向	世界銀行 (-)	自由陣線黨* (+)	強	緩慢
(1985-1990		IDB (-)	巴西民主運動* (-)		改革
年)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PAs :		
		(-)	大型工商業團體與大型私人銀行業 (-)		
			軍方保守派 (+)		
			IVPs :		
			總統 (+)		
			國會 (-)		
		美國政府 (-)	各州州長 (-)		
8.Collor民		IMF (-)	PVPs :		
主政府	市場導向	世界銀行 (-)	國家復興黨* (+)	強	緩慢
(1990-1992		IDB (-)	巴西民主運動 (-)		改革
年)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自由陣線黨 (-)		
		(-)	其他小黨 (+ -)		
			PAs :		
			大型工商業團體與大型私人銀行業 (-)		
			IVPs :		
			總統 (+)		
			國會 (-)		
		美國政府 (+)	各州州長 (-)		
9.Franco民		IMF (+)	PVPs :		
主政府	市場導向	世界銀行 (+)	巴西民主運動* (-)	強	緩慢
(1992-1994		IDB (+)	巴西社會民主黨* (+)		改革
年)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勞工黨* (-)		
		(+)	自由陣線黨* (+)		

				其他小黨 (+ -)	
				PAs :	
				大型工商業團體與大型私人銀行業 (-)	
				IVPs :	
				總統 (+)	
				國會 (+)	
				各州州長 (+)	
		美國政府 (+)		PVPs :	
10. Cardoso		IMF (+)		巴西社會民主黨* (+)	
民主政府	市場導向	世界銀行 (+)		巴西民主運動* (+)	弱 大幅
(1995-2002年)		IDB (+)		自由陣線黨* (+)	改革
		國際私人金融機構 (+)		巴西進步黨* (+)	
				巴西工黨* (+)	
				勞工黨 (-)	
				PAs :	
				大型工商業團體與大型私人銀行業 (+)	

備註：* 表示該政黨為執政黨。

(+) 表示政策關鍵行動者對政府政策有正面的影響力，或與政府關係為正向發展；

(-) 表示政策關鍵行動者對政府政策有負面的影響力，或與政府關係為負向發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本文第四章第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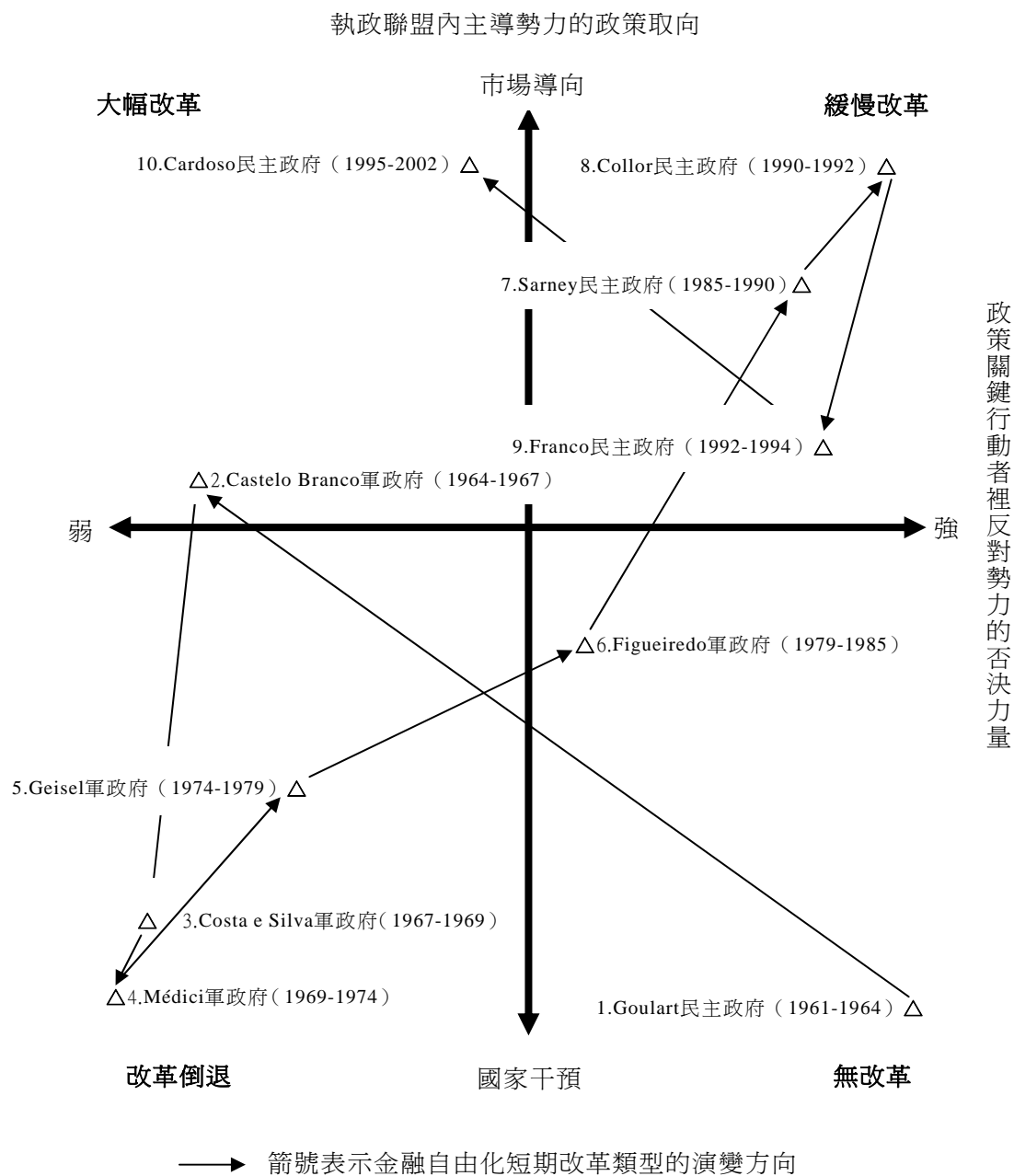


圖 5-3、1961-2002 年，巴西「延緩-有限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演變路徑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表 5-5 繪製。

首先，Goulart民主政府與Figueiredo軍政府時期，巴西的金改歷程均進入無改革階段。Goulart民主政府欲執行國家干預的經濟與金融政策，但國際上美國政府、IMF、世界銀行、IDB與國際私人金融機構等，反巴西左傾的壓力，以及國內社會民主黨與全國民眾聯盟掌控的國會、反Goulart總統的州長、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巴西民主行動協會與軍方集結的強大否決力量，使Goulart民主政府不但無法實現國家干預的政策，最後甚至遭軍事政變推翻。

Figueiredo軍政府時期，巴西雖曾因嚴重外債危機被迫接受美國政府、IMF、世界銀行與國際私人金融機構的改革建議，進行嚴厲經濟調整。但由於Figueiredo軍政府仍偏好國家干預的金融壓抑，且巴西政治開放後包括：反對黨林立（巴西民主運動、民主工黨、巴西工黨與勞工黨），多黨爭鳴的國會、州長、大型工商業團體與大型私人銀行和軍方強硬派等，反對勢力的增強，使得Figueiredo軍政府無法推動任何金改。

其次，Castelo Branco軍政府與Cardoso民主政府時期，巴西同樣出現短期金改類型的大幅改革現象。當時市場導向的政策取向均在Castelo Branco軍政府與Cardoso民主政府的執政聯盟內取得主導地位。Castelo Branco軍政府偏好市場導向政策的立場，遠不及Cardoso總統的執政聯盟強烈。不過，由於國內反對勢力否決力量轉弱，與美國政府、IMF、世界銀行、IDB和國際私人金融機構等，對Castelo Branco軍政府的經濟支持，使Castelo Branco軍政府因而能大幅貫徹金改。

Cardoso民主政府時期，Cardoso總統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信念很強烈。他逐步與美國政府、IMF、世界銀行、IDB及國際私人金融機構改善關係，為金改創造環境。對內他成功建立了巴西社會民主黨、巴西民主運動、自由陣線黨、巴西進步黨與巴西工黨五黨執政聯盟，化解掉國會和各州州長的反對，並提供各種誘因，降低了大型工商業團體與大型私人銀行業的反對力道。上述作為削弱了國內反對勢力的否決力量，而使Cardoso總統成功推動了大幅金改。

Costa e Silva軍政府、Médici軍政府與Geisel軍政府時期，巴西金改陷入改革倒退。三個軍政府執政期間，軍事總統均屬意國家干預的金融壓抑。儘管Geisel軍政府時期，巴西和美國、IMF、世界銀行與IDB，因核武技術與人權問題等爭議

關係緊張，然而由於國際私人金融機構大筆石油美元借貸的挹注，使三個軍政府時期的軍人總統皆因反對勢力否決力量薄弱，得以貫徹國家干預政策。巴西的短期金改類型也因此，進入改革倒退期。

最後，Sarney民主政府、Collor民主政府與Franco民主政府時期，金改緩慢的主因在於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強大。三個民主政府的執政聯盟，都採市場導向的改革。Sarney民主政府與Collor民主政府時期，巴西與美國政府、IMF、世界銀行、IDB和國際私人金融機構的關係不佳。Franco民主政府時期，巴西與這些國際行動者關係好轉，不過三個民主政府最終均因缺乏國會穩定政黨聯盟的支持，再加上反改革的州長、大型工商業團體與大型私人銀行構成的強大否決力量，使短期金改類型同樣進入緩慢改革期。

第四節 結 論

1970年代末迄今，新興市場面臨開放金融市場的共同挑戰，出現金融自由化程度提升的匯聚趨勢。歷經二十多年金改後，各國卻出現短期金改類型變動與長期金改路徑分歧的現象。本文詳細研究1961-2002年，智、韓、巴三國金改經驗，發現這些現象取決於三國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市場導向或國家干預）與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強或弱）兩個因素的組合：

1. 當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為市場導向，而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很弱時，短期金改類型即會因執政聯盟的市場導向政策得以貫徹，進入大幅改革期。智利Pinochet軍政府（1975-1989年）、南韓全斗煥軍政府（1980-1983年）、盧泰愚民主政府（1988-1989年）、金泳三民主政府（1993年）、金大中民主政府（1998-2000年）、巴西Castelo Branco軍政府（1964-1967年）與Cardoso民主政府（1995-2002年）共7個案例均屬此類。
2. 當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為市場導向，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很強時，短期金改類型即會進入緩慢改革期。智利軍事執政團（1973-1975年）、巴西Sarney民主政府（1985-1990年）、Collor民主政府（1990-1992年）與Franco民主政府（1992-1994年）共4個案例即屬此類。

3. 當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為國家干預，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很強時，短期金改類型即會進入維持現狀的無改革時期。智利Allende民主政府（1970-1973年）、民主協定政府（1990-2000年）、巴西Goulart民主政府（1961-1964年）與Figueiredo軍政府（1979-1985年）共4個案例均屬此類。
4. 當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為國家干預，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很弱時，短期金改類型即會進入改革倒退期。南韓朴正熙軍政府（1961-1979年）、全斗煥軍政府（1984-1987年）、盧泰愚民主政府（1990-1992年）、金泳三民主政府（1994-1997年）、巴西Costa e Silva軍政府（1967-1969年）、Médici軍政府（1969-1974年）與Geisel軍政府（1974-1979年）共7個案例均屬此類。

由此可知，三國執政聯盟的政策取向與反對勢力否決力量兩個因素的組合，會導致三國短期金改類型的差異。因為這兩個政治因素會變化，也就造成了三國長期金改路徑的分歧。

綜合以上論點，本研究為分析智、韓、巴三國金改經驗所建立的分析架構，不僅清楚解釋了三國短期金改類型的差異與長期金改路徑的分歧，未來在進一步研究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時，本文從量化指標轉為質化分析所建構的金改類型，更可作為研究其他國家改革經驗的比較基礎。本研究未來將運用相同的分析架構，對更多案例國進行系統性的研究，一方面有助於修正分析架構，提高其解釋力，並延伸解釋範圍。另一方面也可作為研究蒐集不同新興市場金融政治行動者資料的圭臬，以為新興市場金改的比較分析，建立完整詳實的研究資料庫。